



中华春秋

历史转弯处的记忆

——北京老火车站纪事

□ 赵润田

来到北京正阳门的人都会看到位于东南方这座清代末年的历史建筑，高耸的钟楼帅气笔挺，浅灰色楼身舒缓悠然地横亘在便道旁，任人们从身边川流不息，阅尽人间百态。它就是北京前门老火车站，正式的名字镌刻在拱形楼额上：“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老车站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火车站。

重大事件的发生地

老车站是见过世面的。1905年9月24日清廷五大臣出国考察，从这里刚一登上火车，就发生了安庆青年吴樾以炸弹刺杀五大臣的惊人事件。五大臣受伤，吴樾当场牺牲。刺杀大计虽未全面成功，却震惊整个中国，清王朝愈加感受到末日来临。

五十多年当中，几乎所有来过北京的各界人物和平民乘客都是从正阳门车站进出这座古城的。1912年、1924年孙中山曾两次抵京，都是在东车站下车的。第一次是在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北京与袁世凯共商南北统一大事，交通部备好特制花车到天津迎接，东车站盛大的欢迎场面宛如节日。孙中山又于9月1日从这里乘专列视察了京张铁路。1924年直奉大战中，10月，直系冯玉祥突然杀回北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政权，迫使吴佩孚离职，同时将溥仪从紫禁城赶出，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邀请孙中山来京共商国事。孙中山抱病北上，12月31日下午，乘专列抵达东车站，受到北京10万余人在站前及沿街欢迎。来年春，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灵柩也

是从前门东站上车运往浦口的。5月26日，孙中山灵柩由杠夫从香山碧云寺徒步抬到前门火车站，移灵仪式从零点开始，祭奠礼之后启灵，哀乐炮声同时响起。河北省政府主席、代理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骑马开道，迎梓队伍经西直门入城，穿越整个古城，经十余小时到达前门车站。下午5点，前面铁甲车开道，后面铁甲车护卫的灵车缓缓驶离北平车站。天安门广场鸣炮101响，向一代伟人告别。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启。这一仪式，成为前门车站历史上最为隆重的场面。

中国铁路发展史的见证

铁路来到中国，恰是清王朝急遽走向下坡路的时候。

186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首倡从江苏的淮安到北京修建一条铁路，对此提议朝廷根本没有理会。1865年李鸿章再与顺天府议妥，由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宣武门外修一条1公里的铁道，全部费用由英商出，这是中国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出现后，国内保守派惊骇于火车“疾驰如飞”，视为怪物，不久就由清政府禁止并拆除。

1873年，中国皇帝举行婚礼，英国机器制造商兰济筹资5万磅，拟购机车2辆、客货车3辆，修建铁路30里，准备作为礼物送给清廷，结果被一口拒绝。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终于在上海修筑了一条营业性窄轨吴淞铁路，运营了16个月，运送旅客16万人，效果甚佳，却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赎回，拆毁后废弃。

1878年，力主洋务的李鸿章还是不死心，与英国商人议妥，从中南海

紫光阁到北海静心斋修建一条2000米的御用铁路，为的是让老佛爷看明白火车到底是咋回事。于是就发生了用太监人力牵引的奇怪景象，但慈禧到底有些明白了。1881年11月8日，中国第一条营运性的铁路在唐山到胥各庄的线路上开通，但开始时又出现奇闻：用骡马拉着车厢走，因为怕蒸汽机车的巨大声响惊动了东陵地下的列祖列宗。直到第二年才改用机车牵引。

京奉铁路最早肇始于清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年）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段铁路延展为天津路（天津至榆关，即山海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从英国借款修筑北京至天津的京津铁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竣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从山海关延展到奉天（沈阳），至此，京奉铁路全线建成。

北京的火车站最早在城南马家堡，英国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接管了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后，将火车站从马家堡推进到正阳门东侧，共有三座站台，其中两座是风雨棚。光绪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1896—1905年），京汉铁路各段相继建成通车，自北京正阳门西站通达汉口。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1905—1909年），修建了从北京西直门车站至张家口口的京张铁路。1915年12月，从西直门经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到前门东站的线路完工，京张铁路和京奉铁路接轨。1921年京张铁路延伸至绥远，全线改称京绥铁路。从此，全国三大铁路干线汇集前门车站，北京成为全国交通中心，正阳门东、西两座火车站对峙，成为北京城市建设的特别一景。

前门火车站一直使用到1959年9月15日，它为中国铁路运输效力了半个多世纪。它的存在和运营，也成为附近前门大街商圈持续繁荣的有力支撑。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前门大街左右的许多胡同里遇到旧式旅店、货棧和商铺。

前门火车站成为很多人的历史记忆。老舍先生在他的小说、散文中一再出现这座正阳门下的老车站，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曾经以各自不同的命运出现在这儿。北京史专家侯仁之先生记述自己的印象感情最为深切：“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向往之，终于在一个初冬的傍晚，乘火车到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突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把我引进历史的殿堂。”

与前门火车站属于同一时代的还有西直门火车站。旧时，它处在西直门外稍稍往北的巷子里，走过一段长路，到尽头的时候，老火车站就在眼前了。现在，这里经过扩建，称为北京北站，一派现代景象。老车站作为文物不再使用，保留在新站旁。

老车站虽已退出实用历史，但它的象征意义犹在，它是中国人自主建设铁路的历史见证，与京张线上青龙桥等老车站共同成为铁路、文物和摄影爱好者特别钟情的地方，这条铁路与詹天佑的伟大名字一起，成为国人自强不息的激励和骄傲。

人物志

南宋小民虞允文的担当

虞允文这个小人物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肩负起无人担当的职责，力挽狂澜，改变了历史。

□ 徐 佳

大军压境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秋天，南宋的“行在”临安，西湖之畔，依然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如此好景却无人驻足欣赏。整个城市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恐慌笼罩，黑云压城城欲摧。

金国皇帝完颜亮集结了六十万之众的大军，兵分四路，南下侵宋，其中，完颜亮亲率精锐，以“闪电战”般的速度，攻克庐州等地，宋军被斩首数万，将纷纷纷纷南逃。金兵飞渡淮河，屯帐相望，万马齐嘶，天地震动。

南宋君臣已经在江南享受了二十年的“和平”，久不闻金戈之声，当年的宿将老兵已经凋零殆尽，“中兴四大将”死的死，杀的杀，健在的只有刘锜一人。更可怕的是，“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完颜亮在中原厉兵秣马，江南却以为金人虚张声势，不以为意。甚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心念故国的金国使臣施宜生，来到临安后，冒着生命危险，暗示南宋大臣“今日北风甚劲”。怕他们不理解，还借索取笔墨的时机，进一步暗示道“笔（必）来，笔来”。这位使臣回到金国之后，便遭烹杀。可惜他的生命并没有打破南宋朝廷的苟安幻想。

直到金兵渡过淮河，南宋朝廷才如梦初醒，很多大臣打算逃命，高宗也想再次“浮海避虏”。被人劝住后，才起用63岁的老将刘锜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镇守扬州，抵御金军。这时，为时已晚，金兵势如破竹，宋军纷纷溃散。雪上加霜的是，这时主帅刘锜病势沉重，只能靠人抬着担架行走，靠喝粥维持生命，只得把指挥权交给副帅王权。王权畏金如虎，出

征之前与妻儿垂泪诀别，被催促几次才上路。一到战场，便率部闻风而逃，一直逃到南京附近的采石，把整个淮河西部防线暴露给金兵，于是大事更不可支。刘锜也被迫退守江南，防守长江这一道最后的防线。

这时，宋金决战的焦点便聚焦在长江东岸的采石，此处江水平缓，山势险峻，为江防必争之地。当年隋将韩擒虎率军渡江，攻克建康，灭亡陈朝，便是在采石夜渡。这时，守卫采石的宋军只有一万八千人，且都是王权带回来的败军之卒，接替王权担任守将的李显忠还未到任。军中无主，群情惶恐，还没等金兵渡江，便有许多军汉结伴逃散。

历史走势似乎已经毫无疑问，一万余名疲弱不堪的宋军，如同待宰的群羊，固守在采石一隅之地；而数十万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在水一方，饮马大江，历史的舞台似乎又要重演韩擒虎灭陈的故事，而且更为波澜壮阔。主角完颜亮一边吟诵着自己的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一边兴致勃勃地填词一阙《喜迁莺》：“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果见功成朝暮”，并以此来激励将士。他甚至已经安排好攻克临安后，在何处举办庆功宴会了。

力挽狂澜

整个江南笼罩在一片深沉的绝望之中。

然而，这时候，一个小人物突然闯入舞台。

他就是虞允文，时任都督府参谋军事，一个人微言轻的参谋，来自偏远的四川隆州，已经52岁了，他在45

岁的时才勉强考中进士，又熬了好几年，才做了中书舍人这样职位低微的小官。

他出现在采石，也是偶然，只是奉命带着一批银两、酒肉、棉衣来犒劳部队。他到达军营之后，看到士兵“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好像刀俎上的鱼肉，而“敌骑充斥”，金人的侦查部队已经在作渡江的准备。虞允文悲催的命运似乎也已经注定——死于乱军之中。随从们劝他放下这些物资，快快撤走，反正朝廷只是派你来劳军，没有什么守城的职责，何必在这里送死？

这个小人物却摇了摇头，他召集全部军官，斟满酒，大声说：“诸君，国家养育你们这么多年，现在后退一步就是大江，后退是死，战死也是死，为何不能为国而死呢？”这些军官听了都很羞愧，有的低头不语，有的自言自语：“我们也想出力，但是军中连个主将也没有，这仗怎么打？”虞允文听了之后，登上高台，面对所有将士振臂一呼：“李显忠还未到任，我受朝廷之命前来督师，现在听我命令，我与你们一起杀敌报国！”这些宋军将士看着这个身材单薄、鬓角斑白的书生，感受到他必死的决心，受到鼓舞，都站起来穿好盔甲，决心死战。

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众曰“今既有主，请死战。”或曰：“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宋史·虞允文传》）他带着将士们到达江边。这时，完颜亮傲然坐在临时搭建的黄金台上，模仿汉高祖，杀掉白马、黑马祭天，与金军盟誓，先渡江者赏赐黄金。虞允文赶紧把战船分成五队，“其二并东西岸而行，其一驻中流，藏精兵待战，其二藏小港，备不测”。

（《宋史·虞允文传》）刚刚布阵完毕，完颜亮亲手持小红旗，指挥数百艘战船渡江，瞬间便有七十艘战船到达宋军阵地，宋军不敌其锋芒，开始退却。

在纽约上城，河边公园里矗立着“南北战争阵亡战士纪念碑”，每年有许多游人来祭奠亡灵。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南北战争时期担任北方军统帅的格兰特将军的陵墓，坐落在公园的北部。陵墓高大雄伟、庄严简朴，在周围破旧的砖结构楼群中格外抢眼。陵墓后方，是一大片碧绿的草坪，一直绵延到公园的边界、陡峭的悬崖边上。

格兰特将军的陵墓后边，更靠近悬崖边的地方，还有一座小孩子的陵墓。那是一座极小极普通的墓，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可能忽略它的存在，就像一块灰色残破的石头一样。它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陵墓一样，只有一块小小的墓碑，两个多世纪的风吹日晒，上面的文字已变得模糊不清，墓碑上面却记载着一个感人至深的关于信任与托付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1797年。这一年，这片土地的小主人才五岁时，不慎从这里的悬崖上坠落身亡。其父伤心欲绝，将他埋葬于此，并修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陵墓，以作纪念。数年后，家道衰落，老主人不得不将这片土地转让。出于对儿子的爱，他对后继的土地主人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希望新主人把孩子的陵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坏它。购买土地的新主人答应了，并把这个条件写进了土地转让合同，并传承了下去。于是，孩子的陵墓就被保留了下来。

沧桑桑田，一百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不知道辗转卖过多少次，也不知道换过了多少个主人，孩子的名字早已被世人忘却，但孩子的陵墓仍然还在那里，它依据一个又一个的买卖契约，被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到了1897年，这片风水宝地被选中作为格兰特将军陵园，国家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政府成了这块土地无可争议的管理者，面对这段默默无闻的历史遗迹，政府仍然给予了应有的尊重。于是，孩子的墓在政府手中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成了格兰特将军陵墓的邻居，也成就了契约精神的一段佳话。

一般而言，契约条款越精确越便于执行，而“永远”这样的期限描述会因为难以执行而形同虚设。但是，每一位新的土地所有者，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条款，或者说都对小男孩父亲的信任给予了最大的尊重，因此才能不负所托，成就这一美谈。

危急时刻，虞允文冲到最前线，激励将士，他拍着军官时俊的背，说：“以前听说你胆略过人，现在看来跟女子也没啥区别啊。”时俊听了，羞愧难当，即挥双刀出，殊死而战。

这时，虞允文又命令埋伏起来的宋军以海船冲击，这种船比金人的大船小很多，非常灵活机动，击沉了不少敌船。就这样，一直厮杀到了黄昏，宋军杀死很多金兵，自身伤亡也很大。

这时候，有一支从光州败退下来的宋军路过附近，虞允文灵机一动，派人送给这些溃兵旗帜和战鼓，命令他们从牛渚山后出现，张满旗帜，擂鼓呐喊。金兵怀疑南宋的援兵到了，开始后退。虞允文又命劲弓部队，尾击追射，于是大败之，杀金兵凡四千人，俘虜五百余人。完颜亮恼羞成怒，把所有退回来的金兵全部砍头，把从此金军锐气顿灭。消息传到临安，官民一片欢腾。

金军于是放弃进攻采石，转而进攻镇江。老将刘锜正在那里养病，朝廷派虞允文前往协助。虞允文前往探望刘锜之时，刘锜在病榻上拉着他的手说：“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书生手，我辈愧死矣！”

此时，完颜亮因采石战败，愤恨不已，下令三日渡江，否则杀降随军大臣，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此时北方又生内乱，于是军心摇动。完颜亮被身边将士刺杀，金军随即撤回北方。南宋终于化险为夷。后世史官在编纂《宋史》的时候写道：“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转危为安，实系乎此。”

虞允文这个小人物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肩负起无人担当的职责，力挽狂澜，改变了历史。他后来辅佐宋孝宗，经营四川，锐意北伐，成为一代名相。

《吕氏春秋》有言：“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人的一生，关键时刻也许就那么一两次的。如果虞允文在那一刻，选择了苟且偷生，放弃了担当，那么历史将会如何呢？

“两贵”鲜明看贵贱

□ 吴敏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在朝鲜开战。7月21日，中国迫于军事形势和驻朝军队的安全，开始向朝鲜增兵，以防不测。增派的军队都是当时的清军精锐，其中包括记名提督宁厦镇总兵卫汝贵率领的“盛”字军和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奉”字军。两个名字都带“贵”的总兵，在战场上的表现大相径庭。

卫汝贵在接到入朝作战命令及24万两军饷后，立马派人将其中的8万两汇往自己家中。其妻回复他家书一封，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

9月，清军在朝鲜据守的承欢、牙山等要地尽失，困守平壤。总指挥叶志超是李鸿章的得意门生，却极为贪生怕死。左宝贵提出主动出击，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日军一路，进行各个击破，并将自己的五营兵力全部投入战场。可是到了发起总攻之际，叶志超却下达撤军命令，不许左宝贵交战，说是奉了李鸿章的手谕。左宝贵含泪请战，遭到斥责。“盛”军总兵卫汝贵却说：“左将军置将士安危不顾，邀功心切，冒险出击，其心恶也。”

9月14日，长驱直入的日军以一个军两个师团四个旅团的兵力包围平壤，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狂妄地叫嚣：要杀尽平壤城里的抗日分子，驱除中国人，将平壤纳入日本帝国的版图。

主帅叶志超召开战前军事会议，不作守城的军事布置，提出弃城北退，撤回鸭绿江以北。对此，卫汝贵积极附和，搬出李鸿章的“先守定局，再图进取”来压人。左宝贵严厉斥责了叶、卫二人的逃跑言论，得到了马玉昆、丰升阿等将领的支持。会议开到半夜也没有结果，马玉昆和丰升阿返回所部，布置防务。

史海拾零